

# 重铸新时代中国文论主体精神

赖大仁

**内容提要** 当代中国文论的创新建构，对当代文艺的繁荣兴盛起着不可或缺的支撑和引导作用。新时期以来文论的变革发展，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从经验方面看，前一时期有不少理论建构呼应了当代文艺创新发展要求，努力吸收融合各种理论资源，较好地实现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理论自觉与自信；从教训方面看，后一时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主体精神弱化或迷失，陷入了焦虑与困惑之中。要推进新时代中国文论的积极建构与创新发展，需要重建理论自觉自信，重铸主体精神。当今值得着重讨论的问题，一是理论身份问题，它不只是理论，更应当是文学理论；二是理论功能问题，它不只是自为，也应当他为，是二者的辩证统一；三是理论建构问题，它应当立足于文学的本体阐释，并注重各种文论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融合。

**关键词** 新时代中国文论；主体精神；理论反思；理论自觉与自信

坚定文化自信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理论命题，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定文化自信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命题和空洞的口号，而是具有特定的理论内涵和现实针对性。其中最根本的内在要求，就是要确立和强化当代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文化的繁荣兴盛，包括文学艺术的繁荣兴盛。而当代中国文论的创新建构，在文艺观念及其精神价值导向方面，对当代文艺的繁荣兴盛起着不可或缺的支撑和引导作用，其中同样有一个坚定文化自信的问题。当然，当代文论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形态，它有自身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及现实挑战，需要从自身的特点出发进行理论反思，从而坚定文化自信，重铸新时代中国文论的主体精神。

## 一 当代中国文论创新探索的理论反思

要讨论新时代中国文论的进一步发展问题，首先需要对新时期以来文论的变革发展与创新探索进行必要的理论反思，以求获得一些基本的认识。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归结到当代文论主体精

神的问题上来认识思考，应当说其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从当代文论创新探索的经验方面来看，新时期以来有不少理论建构，呼应了当代文艺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努力吸收融合各种理论资源，较好地实现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当代文艺创新发展有积极影响和导向作用，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当代中国文论的理论自觉和自信。

例如，关于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探讨与建构。对这一理论的学理逻辑等方面的问题，文论界存在一些不同看法，这可以继续讨论。笔者认为，这一理论命题在新时期初被提出来讨论，显然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即为了解决当时文艺观念上的矛盾困惑，从而回应文艺实践的变革发展要求。当时文艺观念上的矛盾困惑，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论与审美论的对立。从新时期之前承袭下来的文艺观念，仍然突出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与功能，比较忽视文艺本身的艺术特性与规律，这样的文艺观念，实际上不能适应新时期文艺的变革发展要求。于是文论界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审美论（如审美反映论、审美创造论等），力图对那种过于意识形态化的文艺观念加以纠偏。在此过程中却也出现了另一种偏向，有些人强调所谓纯审美，不承认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甚至主张“去意

识形态化”，这显然是另一种片面性。这两种文艺观念冲突与融合的结果，便形成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论建构。从这个理论命题的提出，到许多学者参与讨论，逐渐形成了比较广泛的共识。从历史观点看，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学理逻辑是否严密自洽另当别论，从实际效果来说，它较好地解决了当时文艺观念上的矛盾困惑，避免走向两个极端，容易为多方面所理解和接受，并对文艺实践产生良好的引导作用。

再如，关于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探讨与建构。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发展，大众文化蓬勃兴起，文学艺术也出现了更加多元开放发展的新格局。一方面，文艺创作的多样化能够适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带来了过度娱乐化和精神价值迷乱的问题。在文艺理论观念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混乱的现象，有的提出躲避崇高、走向世俗，有的倡导感性主义和欲望化写作，有的嘲笑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提倡非理性主义甚至反理性主义，如此等等。针对当时从文艺观念到文艺实践的种种乱象，文艺界和理论界展开了关于当代人文精神问题的大讨论。有一些学者提出了重建当代文艺（文化）新人文精神的主张，文论界的学者则相应提出了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命题，吸引了众多学者参与讨论和进行理论建构。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明确针对当代文学艺术意义与价值的下滑，以及人文精神的淡化与贬抑，倡导以现代性为内核、以新人文精神为基点，重建当代文学艺术新的理性精神。这种新理性精神既反对过去时代非人性和理性至上的旧理性主义，也拒绝欲望化和感性至上的非理性主义，而是追求人的感性精神与理性精神相统一、更加符合人与社会合理健全发展要求的新文艺精神价值。这种现实针对性很强的文艺观念建构，既得到了文论界的广泛认同，也对文艺实践起到了介入作用和积极影响。

此外，还有实践论美学与文论、主体论美学与文论、存在论美学与文论、生态主义美学与文论等，也都在新时期以来文论的变革发展进程中，在不同的理论向度上作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创新探索与理论建构。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时期文论界的创新探索具有比较充分的理论自觉与自信。一

些理论观念至今仍具有广泛影响和启示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的理论探索，为当代文论的创新发展积累了弥足珍贵的有益经验。

从当代文论变革发展中的教训方面来看，当代文论与时俱变的探索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焦虑与困惑的时期。由于市场经济改革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和人们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也借助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广泛影响了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在空前复杂多变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当代文艺的变革发展显得更加活跃而杂泛，同时人们在文艺观念与价值取向方面也显得更加无所适从。在这种情况下，当代文论似乎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主体精神弱化或迷失，既缺少以往那种理论自觉与自信，也缺失了此前那种积极有为的创新探索与理论建构，从而陷入了焦虑与困惑。如果要对此稍加分析，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对新的复杂社会背景下当代文艺变革发展更加活跃而杂泛的现实，当代文论似乎没有及时找到自己的角色和身份定位，对大众化的当代文艺发展潮流也缺乏比较明晰的认识与判断，在文艺观念与价值取向方面也不知究竟该如何加以引导，因而显得有些茫然无措、无所适从或者左右摇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主体精神的弱化或迷失。大众化的文艺发展，适应了市场化和文化产业化的发展要求，具有娱乐化、消费性的特点，能够满足大众的娱乐消费需求，因而这种发展潮流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对此我们应当有一定的理性认识。从另一方面来看，大众化的文艺发展，既然适应市场化、文化产业化发展，满足大众娱乐消费需求，无疑就会有诸如资本逻辑和人性弱点等因素在其中起作用，从而导致娱乐主义与消费主义泛滥，使得文艺精神品格下滑，产生消极负面作用。因此，需要一种机制和力量，来约束和引导这种文艺潮流健康发展，其中当代文论在文艺观念与价值取向方面应当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引导作用。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当代文论比较缺乏这种理性辩证和积极有为的理论建构与有效引导，而是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焦虑困惑和浮躁。具体而言有两种情

况。一种情况是，用习以为常的精英化、文人化的思想观念去看待新兴大众文化现象，看不到它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简单粗暴地对其加以否定和指责，缺少现实关怀与理性批判相统一的评论引导，这种错位的理论批评实际上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另一种情况则是，完全顺应和不加分析地欢呼叫好，甚至引入西方后现代消费主义文化理论，包括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等，为其作合法化与合理性解释，为娱乐主义、消费主义推波助澜，同样缺少应有的理性判断、评论和引导。一段时间里，人们纷纷责备当代文论与批评“缺席”“失语”，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言，由此不难看出当代文论与批评在复杂的现实变革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无力感和主体性缺失。

其次，对当代西方文论各种新思潮、新理论，我们往往只是注重表面上的快速跟进与译介引入，而缺少对其内在关系和理论逻辑的深入研究；至于如何根据我们的现实需要，对这些理论资源进行必要的扬弃与创造性转化，从而有针对性地创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理论，则更是显得不足。

例如，有一段时间，文论界热烈讨论从西方引入的“文化研究”转向之类话题，最终却不了了之。其实，现代西方文论从“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向，所针对的是20世纪前半期形式主义文论过于注重文学“内部研究”的弊端，力图打破文本中心主义的研究模式与套路，从过去文学研究的“围城”中转出来，向“外部研究”的方向转型，以各种所谓“文化研究”的新观念与新方法，使文学研究重新介入当下现实。西方的“文化研究”转向，有他们自身的理由、针对性和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对此应当加以研究，从中获得有益的借鉴和启示。然而当代文论界多是表面化的追逐与炒作，少有从历史和学理逻辑方面进行的深入研究，更缺少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创造性转化与利用。实际上，我们的文学研究历来都并不忽视外部研究，而恰恰是“内部研究”方面显得不足，因而简单地将西方“文化研究”转向移用过来，缺少应有的现实针对性，也难以解决多少实际问题。

再如从西方引进的“反本质主义”问题的讨论，同样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盲目与错位。西方文论中的“反本质主义”有比较明确的针对性，即

反对文本中心主义的理论观念及其批评传统，并形成新审美批评、新伦理批评、新政治批评等各种新的发展趋向。而我们引入“反本质主义”理论是要针对和解决什么问题呢？似乎并不明确。如果说是针对当代文论中的“本质主义”问题，那么有哪些理论属于“本质主义”？倘若把那些被认为是“本质主义”的理论（包括新时期以来重建起来的一些理论）都抛弃掉，那么又还有什么样的理论更能适应现实发展需要？实际上，当代中国文论中存在的问题，可能未必是什么“本质主义”问题，而是“实用功利主义”的问题——过去是过于政治化的实用功利主义，现在则又成了别的实用功利主义，其实都不过是对文学的功利化利用而已。我们并没有真正从“文学是人学”的根本意义上，认真研究文学的本质特性及其价值功能问题，也没有从当代西方文论转向中获得有益的借鉴，而是在“反本质主义”名义下，盲目地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审美化乃至去文学化，等等，把一些原本属于文学本质特性的东西都阉割掉了。其结果是，大家极力回避讨论文学本质论等根本理论问题，导致当代文论陷入更大的误区，从而带来更大的焦虑与困惑。

当然，文论界对此类现象也有所反思。如对当代文论“失语症”问题的争论，由“反本质主义”话题引起的反思，近一时期围绕“强制阐释论”展开的讨论等，都从不同角度提出这方面的问题，并从各种理论向度上展开了探讨。如今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反思和总结过去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找回当代文论应有的理论自觉与自信，重铸新时代文论的主体精神，从而推进当代文论的积极建构与创新发展的。

## 二 重铸新时代文论主体精神 值得讨论的问题

要重建新时代中国文论的自觉与自信，从而推进其创新发展，一方面有必要加强理论反思，另一方面还应当进行积极的建构性探索，才能使其真正落到实处。近年来，文论界再次提出了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命题。围绕这个理论命题，着眼于新时代文论主体精神的重铸，笔者拟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具体探讨。

其一，当代中国文论的理论身份问题：理论还是文学理论？

这本来不成为一个问题，但在当代西方文论观念影响下，却成了难以回避的问题。有学者研究晚近西方文论从“文学理论”到“理论”再到“后理论”转向的重大变局，进而深入探讨了发生这种变革的深层机理，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sup>①</sup>。西方文论自身的历史演变，自有其内在文化逻辑在起作用。前一次转向所针对的“文学理论”，主要是20世纪前半期形成并占主导地位的形式主义或文本中心主义的文学理论，它在开辟文学的“内部研究”领域方面有重要历史功绩，但由此导致文学研究去历史、去政治、去伦理、去价值、去审美、去主体，等等，其片面与偏执的弊端显而易见，因此，也就导致了如前所说的“文化研究”转向，其中包括从“文学理论”到“理论”的转型，力求从此前形式主义文论的象牙塔与围城中突围出来，变成更大范围里的“理论”即文化理论。这种极为宽泛和多元化的“理论”（被称为“大理论”），很快就把所谓“文学理论”淹没和消融了，在无所不能的“文化研究”中，好像再也无须这样的“文学理论”。然而，无论是所谓大文化“理论”还是“文化研究”，实际上也并非无所不能，在风光一时之后同样难以为继，于是就出现了再一次的“后理论”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小理论”，其中也包括重新回到某种新的文学理论研究。

那么，从西方文论这种历史演变中，我们能够获得一些什么样的认识与启示呢？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入门》中曾讨论“理论是什么”的问题，他简要归纳了四个要点：第一，理论是跨学科的；第二，理论是分析和推测；第三，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第四，理论具有自反性（或译为反思性）<sup>②</sup>。从总体上说，他主张文学理论的开放性。这种观点自有道理和启示意义，因此常被文论界引用和阐释。但理论的开放性和反思性（自反性）理应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无限扩张和泛化。笔者想在卡勒观点的基础上表达以下看法。第一，理论是跨学科的，应当努力从其他相关学科中学习借鉴理论观念与方法，用来拓展和深化对文学对象的研究和评论，但是，这种跨学科性并不意味着没有学科边界，更并不意味着不要学科

本体和主体意识，不应当在跨学科研究中导致学科本体和主体意识的自我迷失。第二，理论是分析和推测，它是推测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可能是不可预测的，它未必指向某种预定的结论，因此就需要努力探究研究对象与问题的各种可能性，从而不断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理论创造，但是，承认这种理论探究的不确定性与开放性，也不应当导致以下结果，即怀疑和否定事物的客观规律性、理论探索的累积性和传承性，以及理论成果中所包含的一定的真理性。第三，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常识中可能包含错误，所以应当通过批评来进行分析，更需要通过实践来加以检验，以避免受到常识的误导，但是，对常识的批评并不意味着所有常识都无效，不应当由于对常识的批评而完全不相信常识，走向不要常识或彻底反常识，这种极端怀疑主义与否定主义显然也是不可取的。第四，理论具有自反性，应当经常保持理论的反思状态，通过不断反思发现的问题，寻求创新发展的可能性，这是理论永葆生机活力的根本所在，但是，这种反思不应当是单向度的，即不是像有的极端化解构主义理论那样，只是强调批判性、解构性反思，而是也应当重视建构性反思。这就是说，反思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怀疑和否定过去的理论，而是为了更好地建构新的理论。如果没有这种清醒的认识，即便是理论反思也有可能走向自我迷失。

当代中国文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上述西方文论思潮的影响，在“文化研究”转向和“反本质主义”问题讨论中，围绕文学理论边界扩容问题、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的关系问题等，曾展开过激烈争论，导致相当程度的理论困惑与自我迷失。具体而言表现为三重迷失：一是作为“文学理论”之学科特性的迷失，二是作为“中国文论”之主体身份的迷失，三是作为“当代文论”之当代品格的迷失。当代文论重建的首要前提，是要确认其理论身份，即它应当是文学理论而不是其他什么理论。一切所谓理论观念与研究方法变革问题，都应当在文学理论学科定位与学理逻辑的基础上来加以探讨。无论怎样的跨学科研究和多样化研究方法，最终都要落到具体的文学对象及其意义价值上来。只有确立了这个基本前提，才有可能合乎逻辑地展开对当代中国文论具体问题的研究探讨。

其二，当代中国文论的理论功能问题：自为还是他为？

过去的传统文论观念比较明确，就是重视文学理论的他为性，强调要对文学实践活动起指导作用。但后来人们似乎不太能接受这种观念，反感其高高在上和脱离实际，对文学实践指手划脚干预太多。于是一段时期以来，当代文论变得不那么自信了，开始更多地转向自为性的自我言说和自慰自足。有人认为，当代文论不必依附于文学实践，为其做注释，而是应当转向理论自身的生产，文论自身就可以生产思想和意义。此后，在“后理论”转向的背景下，受西方知识谱系学观念的影响，文论界又出现了一种“知识论”观点，认为任何理论研究都是一种知识生产，都可以归入到相应的知识谱系中看待其意义价值。文学理论也同样被看成某种历史性、地方性知识，被纳入知识生产论和知识谱系学中加以阐释。以上种种现象表明，当代文论不断在现实困境中寻求突围与转向，试图找到某种新的寄身之所和意义价值所在。然而问题在于，这种突围与转向的努力，似乎并未走向当代文论的主体性自觉，而是陷入了新的自我迷失。

在笔者看来，关于文学理论的特性与功能显然不能一概而论，上述看法在特定论域内也不能说没有道理。比如按照“知识论”的观点，以历史的眼光把以往的文论看成一种知识生产，将其归入文论史的知识谱系中去进行考察和研究，从中获得有益的经验与启示，这无疑是有意义的。又如按照“自为论”的观念，不必要求所有文论都关联文学现实，应当承认理论自身也可以生产思想和意义，它可以有相当程度上的自为性。但是，如果我们要在“当代文论”的论域中讨论问题，就仍然需要重视和强调文论的他为性，注重当代文论与批评实践的关系，强化其对文学现实的介入和引导功能。这是作为“当代文论”的根本特性与功能所在，也是判断其是否具有理论自觉性和主体精神的重要标准。对此类问题，其实当代西方文论家也有所反思和强调，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如当代英国文论家塞尔登等人认为，文学研究中的关键问题是理论与批评的关系，近来所谓“理论的失败”就表现为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分离，以为理论可以高高在上，不承认理论与实

践相互印证、相互改变的辩证关系。他们强调“理论是要被使用的、批评的，而不是为了理论自身而被抽象地研究的”<sup>③</sup>。当代法国文论家孔帕尼翁也指出：“只要我们谈理论，就预设了一种实践（此说法并不只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向实践，理论基于并指导实践……文学理论不教我们如何写小说——它教的反而是文学研究，即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或者说文学探索。”<sup>④</sup>当代美国文论家米勒也曾阐述类似的观点<sup>⑤</sup>。从根本上说，当代文论处于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面对历史，需要通过理论反思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代文学和文论自身的发展提供借鉴；面对现实，需要关注和研究文学实践中的问题，不只是一定要“跟”在后面进行评论阐释，而且还要努力赶到前面去，通过创新性理论建构在文艺观念（核心是文艺价值观）方面起到“引”的作用。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理论自觉与主体精神，是难以实现这样的理论功能的。

其三，当代中国文论的理论建构问题：本体阐释与理论资源转化融合。

近年来，在对当代文论进行整体性学科反思的基础上，文论界重新提出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命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这里笔者着重谈两个方面的看法。

首先，当代中国文论的理论建构应当立足于文学的本体阐释。笔者比较认同有学者提出的“本体阐释论”命题<sup>⑥</sup>，对此也有自己的一些认识思考。具体而言，所谓文学本体问题，主要关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学存在本体，即作为文学活动的存在方式、形态以及所涉及的领域。当今时代文学活动显然比过去广阔和丰富得多，但无论怎样广阔和丰富，仍有其基本的特性与范围，从文学研究的意义来说，不应当无限泛化。作为当代文论建构的阐释对象（也是当代文学批评的评论对象），除了传统经典文学是不言而喻的依据与参照之外，就当代文学现象而言，也许可以设想，以那些更能够得到普遍认同的、具有优秀文学品质的文学现象为中心，把当代文学整体现象视为一个不断扩展的圆圈，应着重关注那些靠近中心地带的文学现象。实际上任何时代都有各种泛文学现象，如果把无论什么泛文学或泛文化现象都无所不包地纳入到文论研究，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而且无益于对真正的文学问题的探讨。就

文学阐释目标而言,应着重关注优秀文学品质的方面,同时观照文学的多样化特性,以及不断生发出来的新质,努力对其作出不离文学存在本体而又丰富多样的理论概括和阐释。二是文学作品本体。应当从文学作品(特别是具有优秀文学品质的作品)的文本事实出发,注重从作品文本的阅读感悟中,作出更切合文学实际的理论概括与阐释。当然,理论研究常有从抽象到具体和从具体到抽象两种思维方式与路径,文论研究同样两者都需要。但比较而言,后一个方面可能更为重要,一些真正的文学研究者,几乎不约而同地强调从文学阅读入手。据说伽达默尔在一次学术报告之后,耐心倾听青年学子的提问,当被问到何种方法才适用于严肃的文学研究时,“在难以捉摸的微笑中,伽达默尔回答道:‘慢慢阅读’。”<sup>①</sup>解构批评家米勒也不厌其烦地强调,他所提倡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就是要在文本阅读(修辞性阅读)上下功夫,甚至认为教授阅读与有效的写作,培养一种精于阅读的能力,应当成为人文学科的基本任务和新的原理<sup>②</sup>。总的来说,如果文学研究包括理论阐释不能从文本事实和阅读感悟出发,就很容易成为玄虚蹈空的空洞理论,这应当不是当代文论建构发展的正途。三是文学特性与价值功能本体。可将其理解为文学理论的本体论问题,对它的回答与阐释可称为文学本体论观念。随着文学实践不断变革发展,以及文学价值功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更加多样化和更加充分的实现,我们应当能够对这样的文学本体论问题,作出更符合实际、更具有丰富多样意义的理论阐释。

其次,当代中国文论的理论建构应当注重各种文论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融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文论界已有不少讨论,如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问题的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与当代化问题的讨论,关于西方文论的中国本土化问题讨论等。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实现各种文论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融合,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简单地转换移用。这里可能需要着力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找到合适的切入点。从一段时间以来文论界的讨论情况看,可能较多以话语(或关键词比较)问题作为切入点,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角度。但这类研究不能只是

停留在话语方式的表层,而是需要往更深层次掘进,即深入到文学理论观念与方法的层面进行探讨,才能真正切入实质性问题。此外,或许还可以设想,以某些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或重要命题作为切入点,比如围绕某个基本问题或重要理论命题,着重考察和比较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理论观念、方法与话语等方面的异同,从中找到彼此之间的相通之处,从而寻求实现转化融合的可能性。二是应当与当代文论创新性建构相对接,找到转化融合的理论基点。这也许更为重要,当然也可能更为困难。这种理论基点也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层面,有的或许是某种话语形态,有的也许是某种理论观念或方法,更重要的还是一些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意义的理论命题,其理论建构的体系性更强,实现各种理论资源转化融合的可能性也更大。前面曾谈到新时期以来的前20年左右,在当代文论变革发展与创新探索中,相继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命题,重建了具有新时期特点的新文论形态,其中就转化融合了各方面的理论资源,这种历史经验仍有可借鉴之处。

①参见姚文放:《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晚近文学理论变局的深层机理探究》,《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

②参见[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第16页,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③[英]拉曼·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第10—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法]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吴泓缈、汪捷宇译,第1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⑤⑥参见[美]J.希利斯·米勒:《当前文学理论的作用》,《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第226页,第226—22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⑦参见《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16日,第A04版。

⑧[德]卜松山:《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从传统到现代》,向开译,第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何兰芳